

边界问题研究, 还要注意增加或加强“互利”成分的研究。这尤其体现在探索边界问题的解决路径或解决方案

中, 只有充分照顾到双方利益和需要的方案, 才有可能作为讨论和妥协的基础。□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与新方向

文 / 钟飞腾

“中国周边学”研究的新契机

2008年国际金融爆发以来,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迈入了新阶段。首先, 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瞩目的现象, 而既有的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这种重大现象。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而是一种复兴。按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 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9万亿国际元, 而美国是9.5万亿。这种变化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人们记得, 美国经济总量于19世纪后半期超过英国, 但美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经济体时, 还远不是世界最大, 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55%和印度的75%。直到1890年, 美国才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换句话说, 两个甲子的轮回, 中国在全球的位置有了根本性变革。如果说中国传统周边关系的解体是从19世纪后期逐步开始的, 那么, 目前中国周边关系也正在逐步回归中。

其次, 近十年来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地位。按照麦迪森的数据, 在公元后的1000年间,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大体在1500年之后的500年间, 中国经济总量略高于印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 日本是亚洲的第一大经济体,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 中国经济总量开始两倍于印度, 并于1992年超过日本。2008年, 中国经济总量是

周边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2.6倍, 这种变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果说麦迪森的数据夸大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总量,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最新预测仍然表明这种趋势: 2018年, 中印日三国的经济总量将分别为25.1万亿、10.4万亿和5.4万亿国际元, 人均GDP分别为1.8万、7700和4.4万国际元。

以IMF数据衡量, 早在2007年, 中国经济体量就超过了日印之和, 如果按照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测, 中国的邻国在此之前就应该联合起来制衡中国, 地区稳定性将难以保持。显然, 中国周边外交在维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稳定性依然是牢固的。不过, 过去十年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比如众多周边国家希望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拓展海上实力抱有极大疑虑。周边国家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并且希望中国在地区秩序形成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些问题在传统的中国周边关系中都是陌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的。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平台, 不再完全依靠与西方讨价还价来深化对外开放,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因此可以充分吸纳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 并转化成新型知识体系。由于拥有历史和地缘优势, 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各

个周边省份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将贡献出更多的地区国别知识, 各个行业在周边的深耕, 也会提供许多一手信息。这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个省份与沿边周边国家的关系, 也有助于平衡外交领域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也就是说, 无论是向外, 还是由内, 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都将发生历史性大改变。

在新时代背景下, 发展“中国周边学”, 应明确几项大的任务。一是通过重新探讨历史上的朝贡秩序如何构建了中国与邻国稳定的合作关系, 以明了中国与邻国的彼此认同、文化联系、力量对比以及经济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二是讨论东亚社会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背离了中国这个权力中心, 周边地区被西方瓦解、打碎乃至重建的过程。三是讨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周边次区域力量分布的不均衡如何影响与次区域的关系, 进而讨论以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是否可能重新生成。这些问题可能不是目前西方源流下的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 而要综合多门学科, 比如对外关系研究、新地缘政治学、经济发展新理论、新军事学说以及文化传播学等等。

推进“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四大方向

一是抓住中国特色, 将政策语言转化成富含学理的话语体系。以政策语言指导实践,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陆海丝路首先连通周边，并通过周边连接世界。

模式，在实际工作尤其是涉外工作的具体场景中造成外界对中国式概念的理解难题。学术界应在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政策语言在外交和国际问题部门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从学科角度抽取政策语言中的相关内容予以重新组合，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策进一步总结为理论体系。这也可以确保我们明白地知道什么才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

二是对诸大国的周边外交进行深入讨论和比较研究。一个国家对周边的权力、影响力及其政策关系是否有独特性，要看历史渊源（因历史上的地理限制，很多国家的对外关系实际就是周边关系，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系），也与独特的地缘环境相关，更与近代西方的扩张紧密关联。比如，20世纪以前中国人认识一个国家的邻国，主要是从领土出发的，很少从主权的角度去看。如果选择主权作为界定一个国家邻国的属性，那么我们将发现绝大多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等，都拥有诸多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上岛屿的主权。显然，这些国家的邻国概念不同于中国。这就涉及西方如何管理远离本国陆地领土、但却又属于主权范畴内的主体的一套规章制度。中国对这类内容的认识还不到位，包括对以联合国海洋法为核心的海洋领域

的制度管理体系、国际航空领域的规章制度、跨境水资源合作以及气候变化等。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论上讲应该完全了解西方在成为大国时使用过的一切概念和知识体系，并知道其优劣。

三是拓宽从海洋角度研究周边关系的内涵。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和六个海上邻国（朝鲜和越南重复计算）。中国的未来发展还将依赖于从海上来的资源能源，以及经由海上通向发达地区的出口。世界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1500年以来影响国际局势的国家几乎都与海洋有关，西方的崛起和西方构建的国际秩序都与海洋势力拓展有极大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海洋的需求和认识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的一些做法和认识，应借助于新时代的契机加以重新讨论。中国人在海洋领域的实践，能否增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新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与陆地领域的部门行业交错纵横不同，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识别与海洋相关的利益部门，国家利益大于部门利益的一般性认识究竟能否运用于海洋领域还有待于讨论。

四是开拓研究周边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华关系的联系机制。目前中国的周边研究大体上仍停留在把周边国家当作一个整体的阶段，并且只

研究政府的对外政策，而没有比较深入地了解不同的国家及其国内政治经济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逐步与周边国家发展出一定数量的经贸关系，时间并不长，各方面积累的关系比较浅。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构成、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差距极大，而中国学者在预测周边国家政局时盲人摸象的现象很突出，即便是大略的方向性判断有时也难以把握好。我们对周边国家内政了解不足，还不能做到“知彼”，这既有语言的因素，但肯定也有研究范式的影响。例如美国研究中国的周边问题，是把美国的利益和关切放入其中进行互动考察，而不会把中国放入其中。事实上，美国与中国周边邻国的经贸关系历史较长，利益关系也就深入得多。显然，中国和美国在周边的利益和动机不同，对美国成立的基本变量关系，到中国周边关系中会发生极大的调整。如果我们只是照搬西方的结论，就不易看到变量关系的复杂性。目前我们绝大多数对周边的研究，只是熟悉西方理论的结论，但却不知道理论是怎么生成的。要真正立足于周边国家内政进行研究，既有赖于语言能力的提升，更需要中国周边研究的理论深化。■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